

# 紫禁城之窗

ZIJINCHENGZHICHUANG

—〔美〕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

普里西拉·罗伯茨 编辑

张颖译 潘敬国校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 紫禁城之窗：

〔美〕 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  
1973 ~ 1974

普里西拉·罗伯茨 编辑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张 甄 译  
潘敬国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禁城之窗: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 / [美] 普里西拉·罗伯茨编辑; 张颖译, 潘敬国校译.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6

ISBN 7-5073-2113-4

I. 紫… II. ①罗… ②张… ③潘… III. 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1973~1974 IV.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214 号

---

**紫禁城之窗: 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

---

编 辑 / [美] 普里西拉·罗伯茨

译 者 / 张 颖

校 译 / 潘敬国

责任编辑 / 于俊道

版式设计 / 李 娜

---

出版发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 100017

经销热线 / 63097018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

787 × 1092mm 1 / 16 41.75 印张 635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

ISBN 7-5073-2113-4 定价: 78.00 元

---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紫禁城之窗： 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

(1973 ~ 1974)

1973 年中期,美国在北京建立了对华联络处,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在中国的最后一个领事馆关闭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一个外交机构。戴维·布鲁斯担任联络处第一任主任,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法国、英国和德国大使。他的日记记录了 1973 年到 1974 年间 18 个月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活的生动画面。

布鲁斯日记表明了当时中国政策的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它记录了“四人帮”和邓小平为了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采取的策略,其中涉及到布鲁斯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交流看法的绝密电报,日记还可以使人们对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关于一些重大问题如台湾、贸易和战略核均势进行的会谈有所了解。

这本书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提供了关于这方面的丰富资料。尽管日记仅记录了 18 个月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已表明两国在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关系逐渐取得了进展,尽管政府的态度有时也出现过动摇。这些进展是国际关系取得进展的真正的、持久的源泉。它们开始于戴维·布鲁斯的观察。

亚洲学会会长 尼古拉斯·普拉特

通过展示布鲁斯大使的日记,并结合编辑者对档案的深入研究,罗伯茨博士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和解期间的中美关系。

国家安全档案馆高级研究员、《基辛格手稿》作者威廉·伯尔

普里西拉·罗伯茨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她是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和历史学教授。

## 译者的话

戴维·布鲁斯,曾经先后担任过美国驻法国、德国、英国大使,并担任了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以至尼克松当选总统时,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务卿的当然人选。正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对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与国际形势的全景式记录——《布鲁斯日记》。该日记不仅包括布鲁斯参与和观察当时许多重大国际事件的经历,还包括许多重要的文件,这使其日记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

香港大学的普里西拉·罗伯茨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编辑了布鲁斯在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所作的日记《紫禁城之窗:戴维·布鲁斯的北京日记(1973~1974)》。本书的绪论,每章前的提要、文中用仿宋体排印的部分以及所引的电报内容和注释都是编者的劳动成果。在日记中,布鲁斯记录了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初创以及当时中美政治、经贸、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并披露了基辛格访华、中美关于柬埔寨问题、核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同时,日记还记录了布鲁斯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观察,读起来让人感到饶有兴趣。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努力保持其原貌,但这不可避免地将日记的作者和编者的一些偏颇和错误也保留了下来,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所鉴别。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颖博士负责全书的初译工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潘敬国负责了全书的校译。“难哉译事”,由于水平有限,该书对一些内容的翻译仍存在不足,希望有关专家给予批评指正,并请读者见谅。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研究员,没有他的帮助,本书的出版是难以想象的。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对本书的大力支持是读者可以看到这本译著的前提。

## 致 谢

本书的研究得到了弗吉尼亚历史学会安德鲁·梅隆资金、Hsu Long Sing 基金和香港大学研究会的资助。它的出版得到了华盛顿特区冷战史项目的资助。

弗吉尼亚历史学会阅览室和帕克学院的国家第二档案馆的成员高效地提取资料并且为我的复印提供了方便。香港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忍耐了——我的寻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已经收藏起来的参考书的要求,并允许我将这些书留在阅览室数周。戴维·瑟蒂斯·布鲁斯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的父母在这个时期的照片并回忆了从这时期起的剪贴本,他通读了整个手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斯丹顿,他和他的妻子珍妮特给予我的热情款待对我来说是这个项目最为愉快的经历。如无特别指出,这本书中所列的照片(译文略)均来自他们的家庭收藏。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威廉·伯尔花费了大量时间并不厌其烦地为我查找了一些难以查找的文件。外交研究和训练学会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了口述史资料,本系的托马斯·斯坦利将这些资料转变成我的计算机能够处理的格式。亚洲研究中心的路易丝·梅克帮我将这些手稿排版,她还非常耐心地忍耐了我的多次修改。

我还尤其从克莱尔·霍林沃思博士颇具价值的并且独一无二的见识中获知,戴维·布鲁斯和他的妻子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认识他们。布鲁斯的传记作者纳尔逊·兰克福德不仅鼓励我进行这个项目,而且还帮助我找到许多适合的照片,并慷慨地抽出时间阅读了绪论的初稿并且给以评论。我同样感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杰弗里·韦德博士的好意,他也阅读了绪论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此外,我还利用了由基尔大学戴维·布鲁斯美国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组织的

研讨会的同事和其他专家的观点。在这次研讨会上,我提交了关于戴维·布鲁斯的论文。我向所有的人表示衷心地感谢,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资中筠女士,她慷慨地对戴维·布鲁斯本人和这个时期在中国政治中的戴维·布鲁斯进行了个人回忆。路透社的乔纳森·夏普阅读了整个草稿,并且提出了他对这个时期的评价和回忆。陶文钊教授也通读了整个手稿,他对我对中国政治家的注释的指导是极具价值的。

下列人物对于我追踪特别的资料是有很大帮助的:香港的秘鲁总领事乔奇·卡皮欧;北京尼日利亚大使馆的 V. A. 阿德莱克;奥地利驻香港总领事赫尔穆特·伯克;《纽约时报》的约翰·伯恩斯;香港中国旅行服务社的艾琳·丘阿;北京罗马尼亚大使馆的艾恩·唐卡;卡吉尔有限公司的沙琳·卡伯特;香港文华酒店的萨利·索扎;德克特·普赖斯和罗兹公司的小托马斯·J·迪亚斯科罗;比利时驻华大使馆的弗兰科斯·杜蒙;布西鲁斯国际公司的琳达·J·埃德蒙森;埃及驻香港总领事奥斯马·伊拉夏伊利;布西鲁斯国际公司市场通讯部的比尔·法齐奥;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约翰·弗莱明;学者学会美国委员会的坎德斯·弗雷德;圣路易大学的乔尔·K·戈尔茨坦教授;荷兰驻香港总领事约胡姆·S·哈克玛;匈牙利驻北京大使馆参赞塔玛斯·海杰巴;挪威驻香港总领事罗尔夫·W·汉森;埃塞俄比亚民主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公使沃尔德·霍沃尔特;芬兰驻香港领事马杰塔·海因欧;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特殊收藏部的助理馆员苏珊·希尔德;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爱子·井上;香港文华酒店的安纳贝尔·杰克逊;M. W. 凯洛格公司的丽贝卡·约翰·尼森;圣弗朗西斯科的鲁思·卡姆纳尔;法兰克福特·奥尔盖米档案馆的罗伯特·卡尔;希腊驻北京大使馆的尼科斯·凯行波德斯;新西兰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詹姆斯·凯姆博;瑞典驻香港总领事英戈尔夫·基索;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对外游客部前部长 Y. C. 莱先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公共事务部官员罗伯特·D·莱恩;克劳德·利乌斯;普林斯顿大学马德手稿图书馆的丹·林克;波音公司历史部的迈克尔·J·隆巴迪;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助理新闻专员西莉纳·卢克;康科德圣保罗学院男校友协会执行主任小威廉·R·马修;澳大利亚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安德鲁·马茨;瑞士驻香港总领事琼雅克·梅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卡洛斯和玛丽亚·莫利纳利;Lingnan 基金会的道格拉斯·默里;毛里求斯驻香港领事



馆的 A. A. 奥斯曼;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殊收藏部的克里斯特·L·奥维  
亚斯特;比利时外交部档案保管员弗兰科斯·皮蒙斯;路透社的乔纳森·  
夏普;智利驻香港总领事朱利欧·H·里斯缪乐尔;丹麦驻香港总领事赖  
斯·斯考博;路透社驻香港记者乔纳森·夏普;香港-美国中心的马克·  
谢尔登;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查询馆员苏珊·辛普森;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布鲁塞尔)档案部的安妮-玛丽·史密斯;北京外交学院的苏格教  
授;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驻香港领事馆的 K. Y. 坦格;澳大利亚  
外交部历史司的克里斯·泰勒;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北京)陶文  
钊教授;美国建筑学院萨拉·特纳;比利时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西尔维亚·  
范·斯特里杰特姆;北京外交学院的王为民(音译—译者注);美国驻香  
港总领事情报局的所罗门·旺格;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维维安·旺格;  
荷兰驻香港副领事 W. L. 扎特;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公共事务部的张  
宏(音译—译者注);墨西哥驻香港总领事;科威特驻北京大使馆的工作  
人员。

致

普里西拉·罗伯茨  
香港

谢

# 前 言

## 布鲁斯在中国的回忆

克莱尔·霍林沃思

香港大学

前

言

当1973年戴维·布鲁斯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处官员到达北京的时候，中国方面给予他的常规的“热情欢迎”是真诚的。尽管中国方面强调只要美国还继续承认台湾，那么，美国在中国的代表机构就不会是大使馆，但中国人还是将他称为“布鲁斯大使”。一个友好的表现是许多中国官员根据一部关于布鲁斯的、名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传记书籍称布鲁斯为“政治家和外交家”。毫无疑问，布鲁斯作为杜鲁门政府的美国驻法国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美国驻西德大使和肯尼迪政府的美国驻英国大使的经历为布鲁斯赢得了极高的职业声望。

戴维·布鲁斯在战后不久作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开始了他的大使生涯，之后他就作为一位出色的外交官而闻名。他因为是第一个在二战结束时到达刚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出来的巴黎远郊的美国人而在法国巴黎闻名。人们第一次注意伊万杰琳是由于她的美丽和自然的魅力，但是很快，这些优点由于她对政治的了解、睿智和杰出的谈话能力而暗淡。

作为驻巴黎的英国新闻记者，我是在一次特殊的午宴——他们给予我的轻松的招待会上与他们相识的。不幸的是，在波恩我没有看到他们，但是我记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热情地谈到戴维。在伦敦，他们作为外交家的成功和高效率达到了高峰。他们愿意与女王打交道，并且他们在那

儿过得有滋有味,以至于他们在剑桥彼得豪思学院所属的皮卡迪利大街的静谧的奥尔巴尼大楼中租了一个小小的公寓。

无疑,他们令人瞩目的成功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戴维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方式,这些方式有时可以为他提供比他的同事更高水平的享受。尽管戴维和万杰得到当地人员的很好服务,但在危机的时候,他们两人也能从事繁琐的家务。我记得万杰在奥尔巴尼做烤饼和极好的下午茶的时候,据说,戴维在拖地板。

毋庸置疑,肯尼迪总统相信他们在伦敦工作得非常出色,伦敦大使馆的人也这样认为。令戴维的大使馆同事羡慕的是,戴维和万杰在巴黎和波恩的同事也这样认为。不仅一次地有报告说,戴维将成为国务卿,但是令伊万杰琳失望的是,戴维没有成为国务卿。然而,他们与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基辛格博士经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拜访他们在华盛顿乔治敦区的家。戴维大使的官邸是我所看到的最有品味的一个。除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门和迷人的接待室,还有讨人喜欢的花园、游泳池、隐蔽的车库和供司机使用的小别墅。

当戴维离开伦敦的时候,似乎他的外交生涯结束了。但是国务院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家开始在北京联络处的工作。很明显,美国不能在北京建立大使馆,但是华盛顿与共产党大陆进行接触已经变得极为必要。最初的时候,尽管他们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给予他们的是给外国记者类似的住宿条件。他们毫无抱怨地接受了,直到数周后,他们才搬到一个更大的、更合适的、距离市中心更近的地方。

万杰童年的一段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当时,她的父亲作为一位美国公使在那儿工作,这提高了她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我们多次走过她还是孩子时就熟知的地方。同时,戴维还同中国许多高级官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包括与当时在中国非常有影响的周恩来总理的交往。毛泽东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那时他正处于他的妻子江青和“四人帮”的影响之下;那时,周恩来总理正艰难地领导着政治局和他的政府。

布鲁斯不得不应付一些难对付的访问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赛·苏兹贝格。在中东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赛·苏兹贝格。赛·苏兹贝格与布鲁斯他们住在一起,期望得到与他在西方民主国家得到的相同的待遇。事实上,“邀请”他的中国人精心安排了一些特殊的旅程。我曾和他一起

去了毛泽东的出生地,在毛泽东的出生地我们没做什么。当返回的飞机被延误的时候,他设法打电话给联络处并且向布鲁斯大吵大闹。有的时候,对布鲁斯来说,这种访问确实使得他与中国人打交道更为困难,尽管他们的名声不久就恢复了。

令人悲伤的是,不久就传来了布鲁斯将由乔治·布什代替的消息。当时,乔治·布什在中国还不是很受欢迎。事实上,一些中国官员后来向我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乔治·布什作为一位既没有影响力又不了解中国的高级官员能成为世界惟一强国的总统,而布鲁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却仅在布鲁塞尔从事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的工作,这证明民主还是有一些弊端的。

了解和崇敬戴维和伊万杰琳多年之后,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对美国民主的贡献正逐渐赢得公众的承认。

## 主要人物表

### 伊万杰琳·贝尔·布鲁斯(1914~1995)

在她丈夫的日记中通常被称为“E”，或“万杰”。美丽、端庄而又聪慧的她是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女儿，她的父亲于1924年在北京去世，她的母亲是一位英国人，名字叫埃特尔卡·瑟蒂斯。伊万杰琳·贝尔·布鲁斯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1942年参加了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在伦敦的活动中。在这里，她遇到了戴维·布鲁斯，当时戴维·布鲁斯是该情报局的领导。1945年他们结婚。作为一位大使夫人和女主人，她不仅是领导国际服装潮流的常青树式的人物，而且对她的丈夫的职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她的生活方式非常雅致，罗伊·斯特朗爵士认为她是“所遇到的最为端庄的女子之一，身材修长而优美”，并且指出她“举止优雅”。他们在华盛顿乔治敦区的官邸很快成为美国首都的一个社会景致。直到去世，她都一直保留着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地位。很久以后，当一位采访者问国务院高级秘书雷·E·琼斯（他当时正在北京作布鲁斯的秘书）“谁是最轻松的大使夫人”时，雷·E·琼斯选择了伊万杰琳·布鲁斯。

### 约翰·赫伯特·霍尔德里奇(1924~)

1973~1975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副主任，他代表的机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1969~1973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真正机构。霍尔德里奇出生于美国一个军人家庭，这意味着他大部分的童年是在亚洲度过的。1942~1945年，他在西点军校学习，之后，在军队中服役两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朝鲜。1947年霍尔德里奇进入外交部，他专攻中国研究，曾在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过。1950~1960年间，霍尔德里奇

在香港总领事馆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积累了各种能力。1966~1969年,他成功地担任了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研究室的副主任和主任。之后,他转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亨利·基辛格的高级职员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在此期间,他深深地卷入了美国对华正常化的过程中。1975~1978年,霍尔德里奇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1979~1980年,担任中央情报局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官员;1981~1983年,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从1983年到1986年退休前,任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写过一些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如《跨越分裂:一位知情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说明》(1997)。他的妻子马莎·简·麦凯尔维·霍尔德里奇曾与他一起度过了在北京的生涯。

#### 艾尔弗雷德·利·詹金斯(1916~)

1973年初~1974年5月也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副主任,代表国务院的利益。他工作得很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詹金斯与约翰·霍尔德里奇相处得很好,在后者的回忆中谈到过这一点。二战期间,他在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之后,于1946年进入美国外交部,擅长东亚事务。在他1952~1955年成为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之前,曾在北京(1946年他在北京是副领事)、天津、香港和台北等处任职。1959年成为负责东南亚事务的代理主任以后,他成为国务院的远东政策顾问,直到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任职以后,1966~1969年,他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之后,他成为国务院亚洲共产主义事务办公室主任,在1973年4月担任在北京的职务以前他一直任此职。他的妻子马莎·伊丽莎白·利皮埃特一直陪伴着他。

#### 江青(1913~1991)

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在中国政治中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是后来的“四人帮”中的一员。她原名李云鹤,又名李进,出生于山东省,1930年搬到了青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称兰苹,在20世纪30年代她成为上海的一位二流电影演员。从20世纪20年代起,她有过几次恋爱经历,并且与唐纳结过婚,3年之后离婚。1939年她到了延安,并在那里遇到了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的同事不喜欢江青,并且坚持她不能担任任何

政治职务,但是不到1年,二人还是决定结婚。在20世纪50年代,江青致力于改革传统的京剧以确保京剧反映正确的共产主义态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山东的代表,她成为一位主要政治人物。从1966年到1968年她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并且鼓动红卫兵夺去一些领导人的权力。她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且日益成为7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位重要人物。1976年10月,她与“四人帮”的其他人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被肃清。1981年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sup>①</sup>。由于身患癌症,于1991年自杀。

### 雷·E·琼斯(1922~)

外交部官员,是一位外交部高级秘书助理。1946~1949年,与陆军部一起在柏林度过了几年,1950年进入国务院。1950~1952年在汉堡的军事安全委员会工作,之后直到1955年一直担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在伯尔尼,琼斯做了一年弗朗西丝·威利斯,成为职业大使的第一位女性的秘书。1956~1958年,琼斯返回华盛顿的国务院,从事以色列—约旦问题的案头工作。之后,到喀土穆担任美国驻苏丹大使的秘书,1962年调任到维也纳,一直到1964年。1964年,刚刚被任命为驻越南大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选中琼斯作他的秘书,1965年当泰勒被调到白宫任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时,泰勒带着琼斯一同回到白宫。1970年前,琼斯一直与泰勒在一起,1970年后,琼斯自愿到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工作。在这里,琼斯是塞缪尔·韦斯特菲尔德——美国第一位非裔大使的秘书。一年以后,琼斯调到荷兰,为美国驻荷兰大使J. W. 米登多夫三世工作。1973年琼斯返回喀土穆,但是在到喀土穆不久,美国大使克利奥·诺埃尔被暗杀,琼斯护送他的妻子及其遗体回到华盛顿。国务院建议琼斯到布鲁斯那去作他的私人秘书。琼斯在北京期间,将布鲁斯的日常日记打成定稿,后来他将布鲁斯说成是“我所看到的最出色的起草者……多么出色的英文啊!”琼斯在北京一直呆到1974年初。1974年初,当获知布鲁斯不久将离任时,他返回到柏林,一直到1978年退休。

<sup>①</sup> 1981年1月,江青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译者注

亨利·A·基辛格(1923~)

在布鲁斯日记中经常称为“亨利”或者是“亨利 K.”,1969~1975 年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1973~1977 年任国务卿。基辛格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是尼克松政府时期对美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的设计者和主要的执行者。由于具有犹太血统,年轻的基辛格于 1938 年离开了纳粹德国,1943 年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军队中服役以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同时出版了他的关于 19 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基辛格在这篇论文中集中论述了奥地利王子——范·梅特尼科,基辛格非常崇拜这位王子,并且在某些方面,他自己也仿效这位王子。基辛格还为外交关系委员会创作了一篇关于核政策的论文。尽管他的杰出的智慧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是基辛格真正的志向在管理而不是国际关系。他利用他在哈佛的地位与一些大的政治人物相识并且充当共和党领导人包括纽约市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和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顾问。在约翰·F·肯尼迪时期,他的努力仅使他获得一些不重要的任务,但是,当尼克松成为总统时,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期,基辛格使威廉·罗杰斯成为有名无实的国务卿,1973 年 8 月,基辛格接替罗杰斯成为美国国务卿,并且实际上近似于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戴维·布鲁斯不遗余力地描述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并且如果他的日记可信的话,戴维·布鲁斯还羡慕他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伟大的设计、广泛的概念和重塑国际体系的想象力。除了叙述了基辛格寻求与共产主义中国发展新的关系并且对苏联缓和以及从事繁重工作的巨大的能力外,布鲁斯没有提到基辛格的弱点。这些弱点包括喜欢掩饰和密谋、膨胀的虚荣心、过于自信的个人野心,所有这些弱点决定性地使基辛格产生了不道德的行为并且使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集中到现实主义上,甚至几乎排除了所有的道德考虑。后者表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基辛格卷入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1973 年,当这一行动被发现后,国会将这一行动终止)中,批准对怀疑可能将信息泄露给媒体的官员进行窃听。这些事件使得基辛格成为令美国自由主义者讨厌的人。同样,由于他愿意与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暂时达成妥协,也使得他遭到保守的共和党的谩骂。基辛格出版了他的 3 本回忆录:《白宫岁月》(1979)、《动荡的年



代》(1982)和《复兴的年代》(1999)。

### 毛泽东(1893~1976)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出生于湖南一个传统的农民家庭,17岁离开家,在清王朝垮台以后,他加入了革命军。毛泽东毕生渴求获得知识,在10几岁和20出头的时候,他进入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并且建立了新民学会。在短暂地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以后,1920年他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他打破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有必要依赖于农民而不是依赖于工业无产阶级来发动革命。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是活跃的共产主义者,1927年他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失败。失败以后,他领导起义的幸存者到了井冈山,在那里他建立了军队并且自己担任这支军队的领导者。1934年毛与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一起长征到了陕西省。在1937~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他在延安和延安的郊区度过了相对安全的岁月,并且巩固了他的地位。1946年,当中国共产党和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之间的调解失败后,毛领导了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并最终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执政时期以具有争议和代价高昂的决定,包括1950年末介入朝鲜战争、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百花齐放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受到压制)、1957~1958年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分裂(1962年这种分裂公开,但是根源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标志。1958年中国领导层作出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决定。1966年,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毛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获得了权力,但是在最后几年里毛失去了对他的妻子江青和“四人帮”的控制。作为一个毕生追求不断革命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信徒,毛在必要的时候也能注重实效,并且就是这一特征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支持重新开始发展与资本主义美国的关系以弥补日益困难和危险的中—苏关系。毛在1976年去世,他的遗体现在仍珍藏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的水晶棺里。